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十八大

下册

本书编写组 编



新华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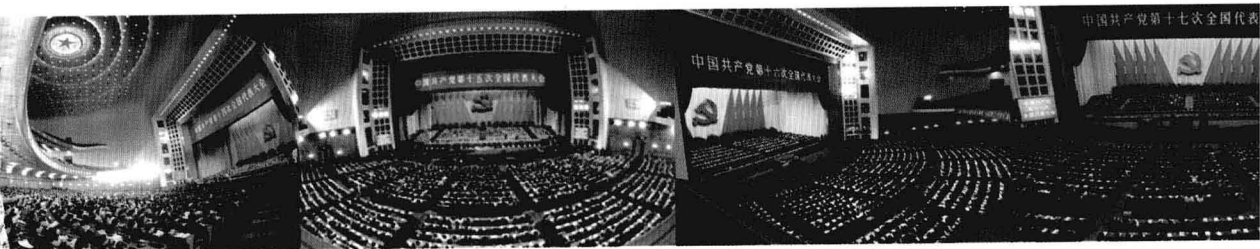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

下册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十八大

本书编写组 编



新华出版社



第九章 究竟让什么人来接班——中共九大

- 一、九大思想基调 340
- 二、筹备过程中的“风波” 345
- 三、“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352
- 四、“一号”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358
- 五、中共九大的评说 363

第十章 左倾错误的延续——中共十大

- 一、周恩来的纠“左”努力 368
- 二、十大的筹备会议 377
- 三、中共十大：不该继续的“左” 382
- 四、邓小平的纠“左”挫折 390



第十一章 建设现代化强国与坚持“继续革命”——中共十一大

- 一、十年内乱的终结 400
- 二、十一大的筹备 407
- 三、错误的理论与理论的错误 413
- 四、新党章的积极成果与局限 417
- 五、“文革”后领导层的新面孔 419
- 六、纠“左”不彻底的原因剖析 421

第十二章 全面开创新局面——中共十二大

- 一、拨乱反正的新形势 426
- 二、筹备中的充分酝酿、公开讨论 434
-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37
- 四、新时期总任务和20年经济发展总设想 440
- 五、日趋完善的新党章 449
- 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 457

第十三章 绘制改革的蓝图——中共十三大

- 一、邓小平为十三大定基调 462



二、一切都要从“初级阶段”出发	468
三、“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蓝图	474
四、干部队伍要“四化”	481
五、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484

第十四章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中共十四大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形势	494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的思想基础	498
三、台前幕后的猜测与酝酿	502
四、首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文献	506
五、意义深远的十四大决策	510

第十五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中共十五大

一、悲祭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536
二、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开拓前进	540
三、擎旗引路把握未来	545
四、面向新世纪的伟大决策	552
五、缔造一个跨世纪的坚强领导集体	559
六、全球瞩目十五大	566



第十六章

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共十六大

- 一、十六大代表的产生 574
- 二、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 578
- 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 588

第十七章 推动科学发展——中共十七大

- 一、努力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604
- 二、十个月的精心筹备与酝酿 610
- 三、紧凑高效的六天议程 616
- 四、理论创新和推动科学发展的重大决策 620
- 五、十七大的会内会外反响 625

第十八章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共十八大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 632
- 二、十八大的精心筹备 640
- 三、紧凑高效的大会议程 654
- 四、十八大报告关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新部署及其理论创新 658
- 五、国内外对十八大的关注 664

第九章

究竟让什么人来接班——中共九大

- 一、九大思想基调
- 二、筹备过程中的“风波”
- 三、“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 四、“一号”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 五、中共九大的评说



一、九大思想基调

九大的思想基调主要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应为1957年。这是因为1956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主要矛盾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八大对此曾作过科学的分析，并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然而，1957年由于国际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和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从而导致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这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便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这个主要矛盾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1959年庐山会议进而认为这一矛盾要存在“三十年”或“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就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绝对化、扩大化了。

1962年4月，在苏联的策动诱骗下，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苏联又在伊犁等地区制造颠覆事件；9、10月间，印度军队数次越过“麦克马洪线”，挑起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集团乘机叫嚣“反攻大陆”，派遣武装特务骚扰我东南沿海地区。这种来自中国大陆外部局势又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等人对阶级斗争严重程度的估量。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天的正式会议上，作了关于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形势（国内形势，这两年究竟如何？）、矛盾（进入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问题的重要讲话。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了“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9月24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天正式会议上，进一步讲到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的修正主义”等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社会当中已经降到次要地位的阶级斗争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呢？其中既有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原因，也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论断误解的缘故，但更为深层的还是1960年冬以来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进行调整的实践，同“三面红旗”及在其指导下执意追求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矛盾。

60年代前期的“调整”，虽然在实践上对“三面红旗”有某种程度的“碰击”，但在理论方面却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我党1958年以来曾经盲目追求的空想模式不但没有受到触动，而且毛泽东在号召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反而还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由于毛泽东等当时的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做我国社会的理想组织形式，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调整实践却恰恰是要对这种模式进行某种改变或削弱。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毛泽东看来，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表现。对此薄一波曾精辟地分析说：“毛主席是同意进行调整的，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步，在某些方面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因而，毛主席就出来干预和纠正了。”^①他在1962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多次严厉批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等，正是从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出发的。把是否坚持“三面红旗”作为标准来评判调整的实践，把对原有理想模式的任何改变都看做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都认为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于是“重提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消除所谓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土壤就是逻辑的必然了。

在阶级斗争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以后，不久又开始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外出调查中，发现湖南、河北一些地方以抓阶级斗争的方法，通过“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形式组织学习十中全会文件，对干部、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感到很好，抓住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7页。



了问题的要点。于是，他回来后便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这些地方抓阶级斗争，搞“四清”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就当时的任务而言，在国际上是反对修正主义，在国内则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会议根据这一思想，制定并发布了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运动的文件，要求各地农村向湖南、河北那样去做，认真抓好“四清”，搞好干部教育，把“牛鬼蛇神”打下去。此后，以“五反”、“四清”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了。

1963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以及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等文件，对城乡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分析。认为目前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已经猖狂起来了，在这些活动中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并断言，“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前十条”进一步分析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总共列举9种表现，如：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社会上，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是他们的同盟军，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复辟，修正主义的表现，如果不对此进行清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因此，必须

^①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呢？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还就“社教”问题作了专门讨论。会议认为，目前农村已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在敌人和敌人的同情者手里；城市里也有的工厂掌握在敌对分子手里；下边发生的问题，根子在上边，朝里有人好做官。从这种认识出发，会议便强调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要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追上面的根子，要划分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断言，中国也出现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进一步明确提出，“这些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那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这些人都是产生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子，所以必须从他们手中把权力夺回来。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不仅要在党外挖，而且要从党内挖，不仅要在下层挖，而且还要在上层挖。这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是在沿着阶级斗争的道路，逐步清理与理想社会主义模式不合拍的做法和坚持这种做法的人。这一实践的结果又直接导致了从意识形态方面清除不同思想理论观点。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于挖修正主义根子在实践中方面的发展，文化领域也开始了清理不同观点的批判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国内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应该抓一下。3月，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检查，停演此类剧目。5月，江青、柯庆施便组织文章点名批判昆剧《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从此拉开了文艺界批判斗争的序幕。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调子的升高，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也越发关注。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员丫环”的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对《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批示中批评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



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①毛泽东还在同一文章下面的批注中写道：“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②

在毛泽东作了这个批示之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年来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系统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③根据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的精神，文化部及文联所属各协会，从十月起再次进行整风，并点名批判了一批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批判了一些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观点。自此，文化界的批判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自文艺界开始的批判运动，很快扩展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963年10月，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提出要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在这种气氛下，从1964年春季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2页。



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等。

对这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主要是认为他们所持有的观点都是所谓“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切实的批判，要把他们手中的领导权夺回来。这实质上是对不同于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观点的清理。

这种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清理意识形态领域里不同思想观点的人，沿着这条线索进一步发展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运动的依靠力量是“革命的‘左’派”。方法是充分运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简称四大），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斗倒、斗垮、斗臭。这一系列的“左”和“斗”，以及通过“左”和“斗”来解决党内问题，便成了九大主要的思想基调。

二、筹备过程中的“风波”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以五年为期。根据这一规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1961年召开。但由于“大跃进”运动之后国民经济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党和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于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工作，无暇筹备九大的问题。而经济困难阶段度过以后，紧接着又是经济调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九大问题始终没能提上议事日程。

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会议决议以后闭幕。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出：“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



备这件事”。^①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姚文元在信中说：

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做了一点调查工作，……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根据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等级党代表会比较有利。”^②

信中仍以红卫兵的名义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信中还说，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或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③

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进行了座谈和讨论，并将意见反馈到中央。11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00页。

^②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1967年10月21日。

^③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1967年10月21日。



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第一批意见进行了整理，并发出通报。

通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九大的根本任务是总结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修改党纲、党章，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建议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彪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关于九大召开的时间，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要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纲党章。八大的党纲党章和刘邓在八大的报告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体现时代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加以批判。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发展一批，清洗一批，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入党。^①

在这个通报中，还包括这样一些意见：如果中央委员会要留反面教员的话，一，只能很少很少；二，必须是认罪好改造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常委中，不能有反面教员。九大规模要大，人数要多，开个万人大会。坐满人民大会堂。

11月5日，毛泽东就九大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

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这些为九大作准备的《通知》虽然都先后发出了，但至1967年年底，大部分省、自治区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所以召开九大只好搁置下来。

^① 《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967年11月27日。



九大在明里准备着，然而康生、江青等人暗里也在做着某种准备。1968年7月21日，康生给江青绝密亲启信，送去了亲笔排列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其中写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总数的71%。这个71%，虽然不都是康生一人打倒的，但也反映了康生的看法。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为九大做准备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全会。全会应出席的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在监狱中或被关在“牛棚”里，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半数。

10月13日全会开幕会上将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共10人补为正式中央委员（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了会议。

在10月13日的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接着毛泽东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

全会一开始，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分组围攻搞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10月17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谢富治说：“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